

“哲学”：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

冯 天瑜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430072）

提 要：自 16 世纪末叶以降，Philosophy 即传入东亚文化圈，欧洲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相结合，将其音译为“斐禄所费亚”，又意译为“学文”、“理学”、“性学”、“爱知学”，然播传不广。19 世纪中叶以降，随着“西学东渐”的纵深发展，作为形上之学的 Philosophy 更受重视，日本启蒙学者西周将其意译为“哲学”，并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，逐渐定型为一个学科名目。“哲学”经历了中—西—日文化的互动，达成概念的涵化，是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。

关键词：形上之学 爱知学 哲学

十年以前，西洋学术之输入，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，故虽有新字新语，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。数年以来，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，而又有一日本焉，为之中间之驿骑，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，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。

——王国维：《论新学语之输入》（1905）

汉字文化圈近代创制汉字新词，以翻译西洋学科名目，较具范式意义和影响力的，是对译 Philosophy 的“哲学”一词。“哲学”的厘定，典型地展示了“中—西—日”三边文化互动过程中汉字新语的生成机制。

一、Philosophy 的“爱智”义

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命题，诸如阴阳、道器、体用、心性、天道、人道、形神、因果、知行等等，直逼哲学堂奥。然而，汉字文化系统内，并无“哲学”一词，也无“哲学”学科的确立，较相接近的称呼有“玄学”、“形上之道”、“理学”、“道学”等，但均不足以担当统括此一学科的总称。时至近代，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，学科意识渐趋明确，以研究本体论、认识论、世界观、人生观、真理观为使命的学术突现出来，需要专门术语加以界定，于是，从西洋引入 Philosophy 一词便成为汉字文化圈诸国的共同诉求。

在西洋，Philosophy 一词的形成过程，正是哲学学科的界定过程。英、德、法语的 Philosophy 皆源于希腊文 Philosophia。Philo 意为“爱”，Sophia 意为“智”，合成义为“爱智”。在古希腊，philosophia 是“爱智慧”之学，而智慧就是生活的艺术，它来

源于神谕，人们热爱并追求它，这就是哲学。第一个使用“爱智之学”的，是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（约前 580～约前 500）。稍后，苏格拉底（前 469～前 399）宣称自己是“爱智者”，其弟子柏拉图（前 427～前 347）更提出“哲学王”理念，展现“哲学”总领诸学的思想。概言之，自古希腊开始，欧洲即有“爱智”义的 Philosophy 一门学科的潜滋暗长，这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说，是研讨百学之“理则”的学问，自古希腊到现代欧洲，有着一以贯之的学脉和范畴系统。

二、早期汉文西书中 Philosophy 的译名：音译“斐禄所费亚”，意译“学文”、“理学”、“性学”、“爱知学”

西语 Philosophy 传入汉字文化圈，是 16 世纪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。欧洲耶稣会士进入德川时代日本和明末清初中国传教，随之带来西方学术文化，Philosophy 为其中之一。自 16、17 世纪之交，日中两国开始对这一西洋术语作翻译尝试。日本文禄四年（1595）印行的天草版《拉葡日辞典》，将 Philosophy 译作“学文の好き”，意为“良好的学文之径”。“学文”采自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学文当为汉字文化圈最初对 Philosophy 的意译。

16、17 世纪之交较高水平的 Philosophy 译名，出自中国的早期汉文西书。明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（1582～1649）所著《西学凡》出版，介绍欧洲大学的学科设置，将其分为“六科”：文科、理科、医科、法科、教科、道科。艾儒略对这六科都给定音译名称，其中理科为“斐禄所费亚”，并有“大斐禄之学”的名目。同书又将“斐禄所费亚之学”意译为“理学”。文称：

理学者，义理之大学也。人以义理超于万物，而为万物之灵，格物穷理，则于人全而于天近。然物之理，藏于物中，如金在沙，如玉在璞，须陶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。¹

艾儒略的另一著作——地理书《职方外纪》，其卷二《欧逻巴总说》介绍欧洲各国教育，谈到中学所设“理科”分为三家：“落日伽”（逻辑学）、“费西加”（物理学或自然哲学）、“默达费西加”（形而上学），三家“总名斐禄所费亚”。这就给 Philosophia 厘定了音译名“斐禄所费亚”和意译名“理学”、“理科”。²

明天启四年（1624）出版的“毕方济口授，徐光启笔录”的《灵言蠡勺》有“斐禄苏费亚（译言格物穷理之学）”的提法。³次年（1625）“高一志译校，毕拱辰删润”的《斐禄答汇》也将“斐禄”意译为“格物穷理”。

与艾儒略大体同期入华的耶稣会士傅泛际（1582～1653）与中国士人李之藻

1 《天学初函》第 1 册，（台北）学生书局 1965 年影印版，《西学凡》第 3 页。

2 《天学初函》第 1 册，（台北）学生书局 1965 年影印版，《职方外纪》卷二，第 3--4 页。

3 《天学初函》第 1 册，（台北）学生书局 1965 年影印版，《灵言蠡勺引》第 1 页。

(1565~1630) 1628 年合译的《寰有诠》、1630 年合译的《名理探》，将 *Philosophia* 音译为“斐禄琐费亚”，意译为“性学”和“爱知学”。“性学”一词出自《寰有诠》，该书称性学为“因性之学”，指根据自然探究天地万物之理、天地万物之原的学问，所谓“性学者，形性之学也”，这显然是从宋明理学的“心性”一词演化而来。

《名理探》创制的“爱知学”，更接近 *Philosophia* 本意。古汉语“知”“智”相通假，“爱知”即“爱智”。《名理探》称：

爱知学者，西云斐禄琐费亚，乃穷理诸学之总名。译名，则知之嗜；译义，则言知也。

爱知学之本务，在通物物之性，性性之理。……凡就所以然处，推寻确义，贯彻物理，皆为爱知学之属分。⁴

《名理探》将 *Philosophia* 意译为“爱知学”，是贴切的，甚至比两百余年后日本思想家西周(1829~1897)的译词“哲学”更为完整地表达了 *Philosophia* 的“爱(嗜)智慧之学”的意义。然而，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介的西学，在中国影响十分有限，较引人注目的是科技类(历算、地理类)，《西学凡》、《寰有诠》、《名理探》等人文学著作译在当时的中国可谓“泥牛入海无消息”，其 *Philosophia* 的译语，如《西学凡》的“理学”、《灵言蠡勺》的“格物穷理之学”、《寰有诠》的“性学”、《名理探》的“爱知学”，鲜为人知，关于 *Philosophia* 的译名尝试并未在中国知识界留下多少印象。

直至 19 世纪中后叶，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译介西学时，哲学的译名与 17 世纪明清之际时译名大同小异。1877 年出版的《格致汇编》载英国传教士慕维廉(1822~1900)撰《培根格致新法》，称哲学为“格学”或“学”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(1839~1899)撰《德国学校论略》，介绍德国大学学科，把哲学称之“智学”。中国士人王韬在《西学原始考》中称：“梭公(指苏格拉底)以理学著名”，把希腊哲学家称“希腊理学”；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亦把希腊哲学家称“希腊理(学)家”。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的《西学略述》也有类似翻译。至于清末的官私学校，尚未把哲学视为独立学科，哲学所涉及的论题混杂在“经学”的总名之下。

三、日本兰学书、洋学书的译名：究理、学文、物理学、性理论、理学、玄学

日本德川幕府中后期相继兴起的兰学和洋学，主要译介西洋自然科学，也涉及人文、社会科学。宽政八年(1796)出版的稻村箭撰《波留麻和解》，将西洋的世界观学问译作“鸿儒”、“硕学的学修”、“究理”、“学文”。兰学家志筑忠雄(1760~1806)1801 年译注《极西检夫尔著异人恐怖传》，创“穷理科”一词，以对译西洋哲学科。

天保十年(1839)，洋学家渡边华山(1793~1841)的《外国事情》创“物理学”、

4 傅泛际译义、李之藻达辞《名理探》上册，商务印书馆民国 30 年版，第 1 页、第 7 页。

“格智”二词，以译介西洋哲学。

洋学家高野长英（1804～1850）在《闻见漫录》中，将 Philosophy 译作“学师”，取义“学问之师”、“总体之学”、“至要之学”。

安政二至五年（1855—1858），洋学家桂川甫周（1751～1809）编《和兰字汇》，用“理学”译西洋哲学。

类似的翻译还有：津田真道（1829～1803）文久元年（1861）的“性理论”；元治元年（1864）村上英俊（1811～1890）在《佛语明要》（此处“佛”为“佛兰西”省称，指法国）中的“天道之说”；庆应二年（1866）堀达之助等在《英和对译袖珍辞书》中的“理学”；明治元年（1868）《学舍制案》中的“玄学”；明治二年（1869）《舍密局开讲之说》中的“知识学”、“熟考知察学”、“考察学”；明治三年（1870）《大学规则二月》中的“性理学”等等。⁵

总之，在幕末至明治初年，日本关于 Philosophia 的译名，纷纭杂陈，莫衷一是。直至西周以“哲学”翻译，方获得规范、统一的译名。

四、西周、津田真道的厘定工作：从“性理论”、“希哲学”、“希贤”到“哲学”

日本学习西洋文化是从科技入手的，德川时代称之“艺术”（采自古汉语的“艺术”义，指技艺）。洋学家佐久间象山（1811～1864）的“东洋道德，西洋艺术”是典型表述。日本人对西洋“哲学”的发现，是幕末洋学机构“蕃书调所”（1856年创办）—“洋书调所”（1862年创办）—“开成所”（1863年创办）培育出的启蒙思想家的贡献，其代表人物是西周与津田真道。西周等人对西学的认识，也是从科技层面入手的，庆应四年（1868）夏，西周在译作《万国公法》的卷头语中说：“方今天下一家，四海一国，火车俭地，汽船缩海，电机以通十里之信，新纸以广四海之闻”，对火车、汽船（轮船）、电机（电话）、新纸（报纸）等西洋物质文明成就发出由衷赞叹。西周等人的可贵处在于，对西学的关注并未停留在技艺领域，而是由西洋物质文明推究其精神文明，将研习的目标直指哲理层面。

津田真道于文久元年（1861）撰《性理论》一文，探讨哲学问题，“性理论”一词，相当于 Philosophy。“性理”指心性与天理，借自宋明理学的关键词。西周还于1870年以“理性”译 Reason。西周在《尚白札记》（1870）、《生性发蕴》（1873）等文中论及：“哲学家”探讨“百科学术”的“统一观念”。“哲学”是成体系的学问，追求“究极的原理”。哲学所论之“理”，包括生理与性理，心理与物理，为此征引《易》的易象、易数之理，《中庸》的中和之理，《说文》的治玉之义，包括脉理、条理、文理，进而与西洋哲学涉及的理性、原理相比拟。西周论哲学之理，有一种打通中西的气势，从而为“哲学”术语的译制奠定基础。关于 Philosophy 的译名，西周启用“希哲学”，是打通中西哲思的产物。西周在为津田《性理论》一文作跋时，使用“希哲

5 参见斋藤毅：《明治のことば》，讲谈社昭和五十二年版，第327—329页。

学”一词：

西土之学，传之既百年余，至格物、舍密、地理、器械等诸科，间有窥其室者，独至吾希哲学一科，则未见其人矣。遂使世人谓西人论气则备，论理则未矣。独有见于此者，特自吾友天外如来始。今此论颇著其机轴，既有压夫西哲而轶之者，不知异日西游之后，将有何等大见识以发其蕴奥也。西鱼人妄评。⁶

津田真道的论文和西周的跋语写于二人 1862 年赴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的前一年。西周跋语中的“希哲学”为“希求哲智之学”的简称，是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（1017～1073）《太极图说》中“圣希天，贤希圣，士希贤”一语中套用过来的。以“希哲学”或“希贤”对译 Philosophy，颇有沟通东西方哲理的意蕴，也生动地显示出：近代日本思想家接受西洋哲理，以中国传统学术作依凭，用汉文古典词充作“格义”西学的工具，汉字固有语汇是译介西洋概念的得力中介。

作为通晓东西哲理的思想家，西周并未在西方哲学与东方学术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他在《开题门》一文中指出：

东土谓之儒，西洲谓之斐卤苏比，皆明天道，而立人极，其实一也。⁷

他既看到东西哲理“明天道”、“立人极”的一致性，也不把东洋的儒学与西洋的斐卤苏比（即哲学）混为一谈。他的学术工作的重心，是向东洋介绍西洋的斐卤苏比（哲学），从而成为一系列哲学术语的厘定者。西周充分利用自己对汉字文化和西语文化的通识，在“中—日—西”三方语文世界间游徙，完成了富于创意的沟通工作，而“哲学”一词的创制，便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。

西周与津田真道留学荷兰莱顿大学，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更加深一层。返回日本后，西周在明治三年（1870）的东京讲学中开始使用“哲学”一词，该讲义的笔记多年以后，方由西周的学生永见裕整理出版，此即《百学连环》。《百学连环》称，Philosophy 有“爱贤、希贤”之义，“亦可直译为希贤学”，又说：

凡事物皆有其统辖之理，万事必受其统辖。所以哲学是诸学的统辖，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，正如国民之受辖于国王。⁸

这里强调哲学是诸学统帅，是“诸学之上之学”，与柏拉图“哲学王”的提法相通。

古汉语没有“哲学”一词，“睿智”、“聪明”义的“哲”字却多次出现，《尚书》有“哲”字十八例（如《尚书·皋陶谟》“知人则哲”等），《左传》有“哲”字五例（如

6 大久保利谦编《西周全集》第1卷，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，第3页。

7 大久保利谦编《西周全集》第1卷，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，第19页。

8 《百学连环》，《西周全集》第4卷，第145—146页。

《左传·文公五年》“并建圣哲”等),《诗经》中“哲”字十二例(如《诗经·小雅·鸿雁》“或哲或谋”等),《礼记》中“哲”字三例。中国古来常将有智慧的人称“哲人”、“圣哲”,如《礼记·檀弓》:“泰山其颓乎,梁木其坏乎,哲人其萎乎!”《左传·文公六年》:“古之王者,知命之不长,是以并建圣哲。”西周深悟此意,所创“哲学”一词是“睿智之学”的意思,虽然未能将 Philosophy(爱智)的“爱”义突现出来,而“智慧之学”的意思则是一目了然的。1870年西周在书简《复某氏书》中出现“哲学的巨臂”⁹等语。而在公开书籍中首见“哲学”一词,是西周于明治七年(1874)出版的《百一新论》。该书“卷之下”论及学科分类,明确地将 Philosophia 译为哲学,他在该书中说:

把论明天道人道,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。¹⁰

并说哲学体现了“百教一致”的精神,物理、心理皆遵奉哲学的法则。¹¹

山本觉马明治七年(1874)二月一日为《百一新论》作序,也多次出现“哲学”字样。其序文曰:

教之与政其理混淆,学者之惑数千年,于兹心理之与物理其学交错,世人之疑亦数千年。于兹我友西氏忧之,由哲学明政教所别,又晰道理之所歧,将辨世人之惑,著斯书名曰《百一新论》,取于百教一致之义也。……西氏于和汉西洋之书莫不讲究,……且能明哲学者,我邦未尝闻有其人也,故余请而刻之以公于世,识数言于卷首云。¹²

这里的“哲学”,取“百教一致之义”,也即“万事统辖之理”。

明治七年(1874)日本建立“东京开成学校”,明治十年(1877)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,包括法、理、文、医四个学部,文学部内设“哲学科”。这是“哲学”一词在日本获得正式地位的开端。但“哲学”与相关词纷然并用,在日本延续了十余年。

西周于19世纪70年代使“哲学”一词面世,但并未立即受到社会及学者的认同。关于西洋世界观之学,另有种种译名,与“哲学”并用,如中村正直(1832~1891)明治四年(1871)译《自由之理》,使用“理学”;明治五年(1872)出版的《和英语林集成》,使用“学术”、“理”、“道理”、“道”;西周本人明治六年(1873)著《生性发蕴》,并用“哲学”、“理学”、“理论”;同年柴田昌吉等编《英和字汇》使用“物理”、“理论”、“理科”;福地源一郎(1841~1906)明治七年(1874)为《东京日日新闻》

9 大久保利谦编《明治启蒙思想集》,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,第30页。

10 《百一新论》,《西周全集》第1卷,日本评论社昭和二十年,第289页。

11 见《明治启蒙思想集》,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,第23—24页。

12 见《明治启蒙思想集》,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,第3页。

撰《社说》，使用“性理学”；儿岛彰二明治十年（1877）撰《民权问答》，使用“理学”；尺振八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译《斯氏教育论》，使用“理学”。

明治十四年（1881）井上哲次郎（1855~1944）等据英国人 William Fleming 1856年编的《哲学词典》，参考《佩文韵府》、《渊鉴类函》和佛学典籍，编译《哲学字汇》，界定“哲学”一词，并以“哲学”作书名，又收录西周创译的一系列哲学术语，如“演绎”、“归纳”等，“哲学”一词的影响力自此大增。但此后一段时间，仍然有西村茂树（1828~1902）的《日本道德学的种类》（1882）、中江笃介（即中江兆民，1847~1901）的《政理丛谈》第三号（1882）等书使用“理学”。中江笃介明治十九年（1886）翻译《理学沿革史》、编著《理学勾玄》两部名著，仍赫然使用“理学”一词。文部大臣森有礼（1847~1889）明治二十年（1887）发表《伦理教科书凡例案》，使用“哲学”一词，日本大学课程也用“哲学”名目。此后，“哲学”一词才在日本通行，成为规范术语。

五、傅云龙、黄遵宪、蔡元培、梁启超、王国维等输入“哲学”名目

19世纪末叶，中国学界开始介绍西洋哲学，但当时尚未使用“哲学”一词，书刊上出现的是“理学”、“心智之学”、“思维之术”、“心理学”等驳杂的名词。严复（1854~1921）译著《天演论》，将 philosophy 译为“天人会通论”，译著《穆勒名学》将 philologists 译为“智学家”。

“哲学”一词传入中国，大约开端于傅云龙（1840—1901）的《游历日本图经》（1889年刊于东京）和黄遵宪（1848~1905）的《日本国志》（1887年撰毕，1895年初刻）。

傅云龙著《游历日本图经》列《杂学校科表》，该表说明文字曰：“有所谓哲学者，西学中之性学也。”黄遵宪著《日本国志》的《学术志一·西学》，列举“东京大学校”的学科，“分法学、理学、文学三学部”，其中“文学分为二科，一哲学（谓讲明道义）、政治学及理财学科，二和汉文学科。”¹³黄氏撰定《日本国志》的1887年，正是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使用“哲学”一词的同一年，也是东京大学设“哲学科”后的第10年。稍晚于黄撰《日本国志》，顾厚琨1888年撰《日本新政考》，介绍东京大学，提及“哲学科”。黄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延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（1895）方获刊印，而傅云龙、顾厚琨19世纪80年代的编著影响甚微，故“哲学”一词在中国得以流传，已到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。

在《日本国志》刊印前的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曾游历日本的黄庆澄（1863~1904）在《东游日记》中论及日本广设学会，其中提及“哲学会”。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上奏皇帝的《请开学校折》，介绍德国大学所设科目，列“哲学”一目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梁启超撰《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》一文，出现“哲学”、“哲学家”、

13 见《日本国志》卷32，《学术志一》。

“哲学思想”等用例，并分论“哲学两大派”：唯物派与唯心派；又区分哲学与宗教：“哲学贵疑，宗教贵信”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梁启超据日文资料，撰《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》，文中多次出现“哲学”一名，称哲学为“庶物原理学”。足见20世纪初梁氏已具体把握“哲学”一词的内涵。

1903年印行的《浙江潮》第4期，刊登署名公猛的《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》一文，是中文报刊较早介绍“哲学”这一新概念的论文。该文对哲学下定义：

哲学二字，译西语之 *philosophy* 而成，自语学上言之，则爱贤智之义也。毕达哥拉士所下之定义，以为哲学者，因爱智识而求智识之学也；亚里士多德亦以为求智识之学；而斯多噶学派以为穷道德之学；伊壁鸠鲁学派以为求幸福文学。哲学之定义如此纷纷不一，虽然，希腊人哲学之定义，则以相当之法研究包举宇宙与根本智识之原理之学也，约言之，则哲学者，可称原理之学。

“原理之学”，即探求事物一般规律之学。此说颇能切中“哲学”的本质。

至20世纪初，以“哲学”命名的日文书籍大量译为中文出版，如井上圆了（1858～1919）著、罗伯雅翻译的《哲学要领》1902年印行；井上圆了著、王学来翻译的《哲学原理》1903年印行；藤井健次郎著、范迪吉翻译的《哲学泛论》1903年印行；井上圆了著、游学社翻译的《哲学微言》1903年印行。

清末影响较大的哲学译著是，德国科培尔在日本的讲演集、下田次郎记录并日译、蔡元培（1868～1940）中译的《哲学要领》（1903年印行），文曰：

哲学者，本于希腊语之费罗索费。费罗者，爱也，费罗者，智也，合而言之，则爱智之义也。

认为“哲学”是“求知此原理及一切运动发现之公例”的“原理之科学”。蔡元培还撰《哲学总论》一文，指出“哲学为统合之学”，是“以宇宙全体为目的，举其间万有万物的真理原则而考究之”，颇得哲学之真谛。

中国人自著的以“哲学”名书的著作，较早的是侯生编撰的《哲学概论》。1906年，上海广学会刊印冯葆瑛《哲学源流考识》，以“哲学”为全书关键词，并指出：“哲学一家遂为过渡时代转移之目的矣”，具有“唤醒国民之灵魂，持示教科之正轨”的作用。

总之，清民之际，日源词“哲学”逐渐取代中国原用的同类词“理学”、“玄学”、“性理学”、“形上学”，正式以学科名目被国人认可。其间王国维劳绩卓著。

国学大师王国维（1877～1927）学涉文、史、哲。他早年译介西洋哲学论著十余种，署名译著便有7种，其中日本桑木严翼（1874～1946）的《哲学概论》（海宁王国维译本，1902年刊于上海教育世界社出版的《哲学丛书初集》），直接涉及 *Philosophy* 译名“哲学。”《哲学概论》的“第二章 哲学的定义”，王氏的译文为：

“哲学”之语，本译字而非本来之成语，人人知之。其原语谓之“斐洛苏非”或“斐洛苏非亚”，即于：

英语：Phoilosophy

德法语：Phoilosophie

拉丁语：Phoilosophia

其他于意大利、西班牙、俄罗斯等，或代 Ph 以 f。此由文字之变更，而其义略同。此等诸语皆出于希腊语之斐洛苏非亚 *phoilosophia*。今分析此希腊语，则自斐利亚 *phoila* 与苏非亚 *sophia* 二语（合）成。斐利亚译言“爱”，而苏非亚者，“智”之义也。故“斐洛苏非”，若以其语源译之，则可称为“爱智”。然其真义必非但爱智之义，而有究理探真之义者也。然而考其译语“哲学”之“哲”字，《尔雅·释言》曰：“哲，智也。”扬子《方言》亦曰：“哲，智也。”又如《书·舜典》所谓“哲，文明”，睿《说命》所谓“知之曰明哲”，皆与原语之“苏非亚”有所似者。……求之古来我国（按，日本）及支那所用之文字，如宋儒所谓“理学”，与其真义相近。然理学之语，今日用为自然科学之总纲，即总称物理学、化学、天文学、地质学、博物学等。故不关其意义之远，而袭用哲学之名称，或反有避误解之益欤？况哲学之语义反近于斐洛苏非之原义欤？¹⁴

王国维的这一译文，相当周全地论述了以哲学翻译斐洛苏非的过程及理由。

清末中国朝野尚不接受“哲学”一词，管学大臣张百熙（1847～1907）上奏称：“盖哲学主开发未来，或有鹜广志荒之弊”，认为哲学使人好高鹜远、不切实际，故朝廷 1903 年颁布的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（即“癸卯学制”）从大学科目中取消哲学一门，以“防士气之浮嚣，杜人心之偏宕”。有鉴于此，王国维 1903 年撰《哲学辨惑》一文，论证“哲学非有害之学”、“哲学非无益之学”、“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”，并申述译名“哲学”与中国固有名词“理学”相通，委婉地规劝国人不必惊骇，用不着诟病外来的“哲学”一名：

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！观去岁南皮尚书（按，张之洞）之陈学务折，及管学大臣张尚书（按，张百熙）之复奏折：一虞哲学之有流弊，一以“名学”易“哲学”。于是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。夫哲学者，犹中国所谓“理学”云尔。艾儒略《西学凡》有“斐洛苏非亚”之语，而未译其义。“哲学”之语实自日本始。日本称自然科学曰“理学”，故不译“斐洛苏非亚”曰理学，而译曰“哲学”。我国人士骇于其名，遂以哲学为诟病，则名之不正之过也。¹⁵

14 转引自佛维：《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，第 7—9 页。

15 王国维：《哲学辨惑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 55 号（1903 年）。

王氏此议的主旨中肯，对两位张姓尚书排斥“哲学”的谬说所作的批判，及时且有力。

然而，

王氏关于日本译名的“理学”、“哲学”之辨稍有偏误：日本早在幕末即以“理学”意译

Phoilosophy，至明治初，西周等以“哲学”意译 Phoilosophy，方把“理学”作为自然科

学的总名。王氏认为日本称自然科学曰“理学”在先，这是千虑一失。

时过两年，王国维撰《论新学语之输入》（1905）一文，更明确地强调新语输入的重要性：

近年，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，则新语之输入是已。言语者，思想之代表也。故新思想之输入，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。¹⁶

王氏同文还特别强调，不仅要引进科技类术语，包括“哲学”在内的“形而上”新语的引入，对“文学”（指人文社会科学）的发展至关重要。当时朝廷讨厌从日本输入的“新名词”，《奏定学堂章程》的《学务纲要》专列“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”一条，对“袭用外国名词谚语”的行为大张挞伐，声明“中国自有通用名词，何必拾人牙慧。”针对此种保守之风，王氏充分肯定输入新名词的必要性，认为日本人创制的汉字译词，理当为中国人借用：

十年以前，西洋学术之输入，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，故虽有新字新语，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。数年以来，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，而又有一日本焉，为之中间之驿骑，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，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。……至于讲一学、治一艺，则非增新语不可。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，则沿而用之，何不可之有？¹⁷

王国维不仅是译语“哲学”较早的推介者，而且也是理性地对待外来术语的倡导者。其哲人风范殊堪效法。

总论之，清末虽有蔡元培、梁启超、王国维等人倡导译介“哲学”，但由于张百熙、张之洞等管学大员的抵制与阻挠，“哲学”这一学科名目并不能在中国通行，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建立，迟至宣统三年（1911）方有哲学专业之设，而且还称为“理学门”，直到民国三年（1914）才更名“哲学门”。足见“哲学”一名在中国被承认并得以通用，是颇历坎坷的。

16 王国维：《论新学语之输入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96号（1905年）。

17 王国维：《论新学语之输入》，《教育世界》第96号（1905年）。